

传播为翼 保护为根

——嘉峪关长城文化传承的双向赋能

张晓燕

在河西走廊中部的茫茫戈壁之上，嘉峪关长城如巨龙蜿蜒矗立，承载着千百年的华夏文明与丝绸之路记忆，散发着夺目的光芒。在传统文明与现代科技碰撞的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让这份厚重遗产焕发生机，成为文物工作者面临的时代课题。2025年6月，嘉峪关长城研究院的《暖风习习——戈壁上的宝贝》访谈节目，从全国5300余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评2025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项目”，这不仅是对长城文化传播实践的高度认可，更彰显了嘉峪关在“传播”与“保护”双向赋能上的深刻探索。近年来，嘉峪关市以体制改革为根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公众参与为纽带，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新路径，让戈壁上的“宝贝”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精品传播破圈： 让文物保护理念直抵人心

文物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遗存本身，更在于其承载的文化精神能够被当代人感知、认同与传承。《暖风习习——戈壁上的宝贝》正是抓住了新媒体传播的核心优势，以国际化叙事视角为桥梁，让嘉峪关长城的故事跨越地域与文化边界。不同于传统文物宣传的宏大叙事，该节目聚焦长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遗产细节，通过访谈形式将文物工作者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让观众在鲜活的故事中触摸文物保护的温度与厚度。这种“小切口、大内涵”的传播方式，使专业的文物知识和守关人的经历变得通俗易懂、深入人心。

作为国家文物局与中央网信办联合推广的精品项目，《暖风习习——戈壁上的宝贝》的传播效果远超节目本身。它借助国际传播渠道，为中华文化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让海外受众了解到中国在文物保护与传承方面的不懈努力与显著成就，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包容。同时，在国内传播层面，节目通过国家文物局微信视频号等平台集中展播，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使“长城保护”成为公众热议的文化话题。

事实上，《暖风习习——戈壁上的宝贝》也是嘉峪关长城研究院遗产传播实践的一个缩影。多年来，该院持续打造的“长城讲堂”专题系列活动，以“线下讲座+网络直播”的形式，构建起文物保护知识传播的常态化平台。2025年9月举办的“基于真实完整性原则的夯土长城保护加固研究与实践”讲座，不仅吸引了200余名行业从业者现场参与，更有3000多位文史爱好者通过网络直播同步收看。讲堂中分享的夯土长城保护技术与案例，让公众直观了解到文物保护背后的科技支撑。这种“专业+普及”的传播模式，既提升了公众的文物保护素养，也为文物保护工作争取到了更广泛的社会

支持，实现了传播价值与保护需求的精准对接。

体制机制革新： 筑牢保护与传播的联动根基

文物保护与传播的有效联动，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嘉峪关长城研究院的发展历程，正是一部以体制改革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史。对标敦煌研究院的先进模式，嘉峪关丝路（长城）文化研究院升格为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并挂“甘肃省长城保护研究中心”牌子，实现了全省长城保护研究职能的统筹整合。这种体制调整打破了以往文物保护与传播工作的条块分割，构建起“研究—保护—传播—利用”一体化的工作体系，为两者深度融合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此框架下，文物保护的最新成果及时转化为传播内容，让传播始终扎根于扎实的保护实践。研究人员深入开展野外调查、数据测量、课题研究，对嘉峪关境内的长城资源进行全面普查与系统梳理，这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与保护案例，成为新媒体传播项目的核心素材。

2025年9月，嘉峪关长城研究院重点推出短视频栏目《晓燕说长城》，从文史专家和文博工作者的视角出发，以大众关心的热点话题为宣传重点，从嘉峪关长城开始，扩展到整个中国长城，重点讲述与长城相关的地理、建筑、诗词、历史人物、保护修缮、非遗等内容，获得大众一致好评。

作为全国唯一的长城专题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嘉峪关市印发《甘肃嘉峪关长城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细化5大类25项任务，进一步强化了保护与传播的联动机制。在保护层面，重点实施夯土长城加固、文物数字化建档等工程，确保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在传播层面，同步规划建设文化展示、科普教育等配套设施，让保护成果能够通过更多元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体制机制的创新，如同为文物保护与传播安装了“双引擎”，推动两者协同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 构建保护与传播的沉浸式场景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技术创新为文物保护与传播提供了全新可能。嘉峪关长城研究院敏锐把握时代趋势，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物工作的各个环节，既提升了保护的科学性与精准性，也创新了传播的形式与体验，实现了技术赋能的双向升级。

在文物保护领域，数字化手段成为破解长城保护难题的关键支撑。嘉峪关长城研究院运用三维扫描、无人机巡查、环境监测等技术，对长城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全方位、高精度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建立起完整的长城数字档案。通过这些数据，文保人员能

够实时掌握夯土长城的风化程度、结构稳定性等情况，精准制定修复方案，实现“对症下药”的科学化保护。例如，在夯土长城加固过程中，基于数字化监测获得的环境数据，选择适配当地气候条件的修复材料与技术，最大限度减少自然环境对文物的侵蚀，这一过程也被详细记录并融入近几年的新媒体传播内容，让公众了解到数字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实际应用。

在传播展示方面，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愿景成为现实。2024年，嘉峪关文旅集团打造的中国首部原址实景长城文化沉浸式夜游灯光剧《天下嘉峪关》，通过光影视觉与长城本体的完美融合，再现了丝路商贸的繁华景象与长城的雄姿，3次登上央视《新闻联播》，带动关城景区单日游客峰值达5.3万人次。这种沉浸式传播方式，让观众在震撼的视听体验中感受长城文化的魅力，同时也直观认识到长城保护的重要性。

公众参与赋能： 凝聚保护与传播的社会合力

文物保护从来不是文物部门的独角戏，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近年来，嘉峪关市通过丰富的研学实践、互动活动，引导公众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保护参与者、传播者，构建起“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文物保护新格局。

嘉峪关长城研学基地的建设，成为连接公众与文物保护的重要纽带。基地推出了风雨雕石艺画、“修”长城、砖壁画复制、黑山岩画复刻等多项研学项目，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长城文化的魅力。当孩子们亲手触摸戈壁上的石头，亲手复刻历史的印记，他们对长城的感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保护长城的种子就会扎根在他们心中。

同时，新媒体平台也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提供了渠道。嘉峪关长城研究院通过快手、微信公众账号等平台，发布长城保护动态、文物知识科普、研学活动纪实等内容，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正是通过这种“线上传播+线下实践”方式，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长城文化的“宣传员”与“保护者”。

从《暖风习习——戈壁上的宝贝》的传播破圈到数字化保护的技术革新，从体制机制的系统重构到公众参与的广泛动员，实践充分证明：文物保护与传播从来不是相互割裂的两个环节，传播为保护注入社会动力，保护为传播提供核心内容，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

戈壁的暖风依旧吹拂，长城的故事还在继续。践行“保护与传承并重”的发展理念，以传播为翼、以保护为根，在守正创新中让长城的文化魅力持续绽放，将会是嘉峪关长城脚下守护人未来的伟大使命！

（作者单位：嘉峪关长城研究院文化交流中心）

大韩墓地位于山东省枣庄滕州市官桥镇大韩村东，地属古泗水流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于2017—2020年考古发掘清理东周墓葬198座、车马坑2座，其中战国小型平民墓葬150座、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中型贵族墓葬48座。相关研究认为该墓地在春秋晚期（或至战国前期）应属鄅国，同时该墓地又包含其他多个诸侯国的文化因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自2018—2023年分两期修复完成的1248件组青铜器绝大部分源自该墓地中型贵族墓，只有极少数来自该墓地的平民墓葬。

与东周时期掌握丰厚资源、拥有先进铸造技术的大国相比，山东地区的小小国力尚不清晰，可能受限于小国财力，也可能因器物多随葬使用，这批青铜器铸造质量较差，加之埋葬环境复杂、多材质随葬品混杂影响，使其保存状态进一步恶化。项目中一千多件青铜器有多半处于残损或严重残损状态，涵盖了青铜器的各类常见病害，且活动病害与可诱发病害较多。

考古出土文物保护与修复有三大主要任务：其一，文物不同于一般的“物”，其区别就在于文物蕴含价值遗存的特殊性，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出土资料，其保护修复的过程应当包含价值遗存信息的全面揭示，即要知道为什么要修文物、应该保什么？考古出土青铜器的保护，应在获知器物形态（形制与纹饰）的前提下关注其本体及表面丰富的遗存（制作遗存及使用遗存），例如制作材料与工艺（含本体及表面装饰）蕴含古代社会手工业技术、资源及背后的人群信息；例如器物使用过程中遗存的一些“仪式”或“情景”类的遗存，像可见的祭祀用品，像一些器物上的贯穿、缠绕、覆盖或灼烧用火现象等，又或像一些腐朽的，仅能依靠锈蚀状态的不同来辨识或者肉眼不可见的有机质残留物。其二，文物又不同于一般的“物”，自然会面临各类腐蚀变化。对金属材料的腐蚀与防护一直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物实质上是更为复杂的“物”的复合体，对其腐蚀与防护研究也是文物保护修复要面对的问题。最后，作为出土文物，除了满足考古报告编写及各类研究的需要，最终要以何种状态去面向社会、面对公众，也应是当代文物保护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着既要修复保护文物本体，又要挖掘文物价值遗存、尽可能追溯文物原真性与完整性的宗旨，项目团队遵循全面调查文物本体及病害信息，研究文物制作、流传、使用等遗存信息以及锈蚀状态及机理，并以此为根据选择合适的技术处理并确定最终修复完成状态。通过系统科技分析了解合金材质特征及其个体性、历时性变化规律，了解铸接材料从以铅为主到以铅锡合金为主的变化历程，了解青铜器芯材特质点以及不同区域制造技术的差异与交流，了解制作这批青铜器料铅资源的多样性、主次性与历时性变迁，了解作为表面装饰工艺的错嵌、铸、菱形暗纹以及上述三类工艺所体现的古人对青铜外观及色彩的追求，并通过表面刻划工艺寻求古代工匠的刻划工具以及运笔手法，透物见人，了解锈蚀层可能保存的器物原始使用信息，并启示我们对青铜乃至金属文物除锈的关注与反思，通过对青铜锈蚀状态、锈蚀产物以及埋藏土壤环境的科学分析了解器物出土状态与锈蚀的复杂多样性，探讨锈蚀特征与土壤环境对这批青铜器腐蚀的影响。

在修复技术处理环节根据每件文物的不同状态，适时调整技术处理步骤。针对考古出土文物，注意保护其表面遗存，并系统化科学取样，留作科学分析的可用样本。另外这批器物多数器壁薄、矿化脆弱使得变形后的矫形、残缺部分的补配、碎片的连接成为修复技术难点，项目组借鉴传统金属工艺以及传统青铜文物修复方法完成修复。另外，也尝试用三维扫描采集青铜器的风格特征，进而尝试3D打印修复与计算机虚拟修复，积极探索考古出土文物保护修复的最终完成状态，思考考古出土文物如何面向社会公众。

项目全过程实现修复档案信息化，完成超大体量考古出土脆弱青铜器的保护修复，使相关研究成果持续产出。培养了一支年轻保护修复团队，使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能接续相传。认识到保护修复好文物不仅需要工匠精神，也同样需要科学精神，只有两者兼备才能更好地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理解文物，这也是新时代文物工作的严格要求。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版责编：张硕 陈尚宇 何文娟

代金龙

第九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解读

陈飞

湖北省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正式公布了第九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湖北省在“十四五”期间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举措。此次公布新增15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有3处与现有省保单位合并，总计154处不可移动文物得到升级保护，体现了湖北省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第九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背景

湖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要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命。要以更高定位、更严标准、更实举措，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红色文化，持续提升湖北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让荆楚文脉在新时代赓续相传、焕发生机。在湖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截至2025年12月30日，复查三普文物36473处，新发现文物6395处，调查不可移动文物共计42868处。

贯彻落实国家文物工作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在申报阶段明确规定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新修订文物保护法中“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要求，切实履行文物保护利用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这延续了湖北省每隔几年公布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传统做法，与第八批公布（2021年）保持了合理的时间间隔。

高效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湖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以来，工作成效显著，经验做法创新，取得了多项阶段性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包含了27处湖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新发现。这些新发现文物的纳入，不仅丰富了湖北省的文物资源体系，也展示了湖北省四普工作的积极成效。

服务全省发展战略需求。湖北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整体提升支点的文化影响力”，文物保护利用是其中的关键之一。新公布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旨在加强荆楚文化、长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为“支点建设”大局注入文化动能。这些新晋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展示荆楚文化灿烂成就、揭示中华文明悠久发展史的重要载体。

完善文物保护体系。截至第八批公布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数（实有数量）为920处。第九批公布后，这一数量将进一步增加，文物保护体系更加完善。从结构上看，本次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包含古遗址24处、古墓葬16处、古建筑36处、石窟寺及石刻5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第九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特点

紧贴文物保护工作实际。第九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阶段为减轻基层负担、提高申报效率，可直接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调查登记表作为申报材料。

一是注重填补空白与加固短板。从地域分布看，此次认定覆盖了全省所有市（州、林区），特别是加强了对文物资源相对薄弱区域和空白点的补充。例如，对神农架林区“黄连队洞穴群”（旧石器时代）的认定，填补了鄂西高山地区早期人类活动考古的重要空白；对恩施州利川市“金竹湾崖墓”“庙耳子崖墓”（东汉）的纳入，则强化了鄂西南地区汉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助于文物保护的地域平衡，织密了全省的文物保护网络。

二是聚焦四普成果与重要新发现。本次公布的名单中，有27处为四普新发现直接公布为省保单位。十堰东软村旧石器遗址作为汉江、堵河流域古人类演化廊道上的关键一环，对构建百年以来中国古人类的迁徙与生存图景具有重要意义。来凤县狮子桥水利水电工程旧址作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同志默默奉献的工作成果，共同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红色记忆，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三是回应基层诉求与社会参与。许多散布于乡间的古祠堂、民居、桥梁、渡槽等，与当地社区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联系紧密。将其提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既是对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肯定，也激发了社会参与保护的热情，为下一步建立更有效的属地管理、全民参与的保护模式奠定了基础。

紧紧围绕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本次公布省保单位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深刻体现了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型与升华，全面彰显了新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观。

一是格局求“大”，构建保护体系。名单极大地拓展了保护范畴，超越了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的传统框架。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含合并项目共73处，占比超47%）的大量入选，包含工业遗产、农业水利遗产、革命文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物等纳入文物保护范畴，共同构建了一个时空覆盖广泛、类型丰富多元的“大遗产”保护体系。

二是站位求“高”，服务国家战略。主动将文物保护置于国家发展大局中进行谋划，密集分布于长江及其主要支流沿岸的文物点，体现出长江文化保护传承作为核心脉络，为阐释长江文化内涵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也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的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源，使文物保护成果直接服务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三是根基求“实”，巩固考古优势。通过系统性地梳理与评定，进一步夯实了湖北作为文物大省、考古强省的坚实基础。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商周时期，遗址序列完整、谱系清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关键证据，巩固和提升了湖北在中华文明演进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四是尺度求“长”，贯通古今文脉。名单的时间轴线实现了极大延展，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直至20世纪的当代

遗产，完整贯通了地方历史文脉。这种“贯通古今”的超长历史尺度，凸显了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强调了对20世纪遗产、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遗产的保护，使文化遗产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

五是价值求“丰”，深化内涵认知。该项工作体现了对文物多维价值的综合考量与深刻理解。不仅关注文物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更加强调其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与情感价值。“武汉剧院”“八燕渡槽”等标志性建筑和民生设施，是对文物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和社会情感的珍视，体现了对其内涵认知的深化。

凸显文物保护成果的广泛性与代表性。第九批省保不仅是对重要文物的简单罗列，更是一次经过科学评估、系统规划的成果展示，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和鲜明的代表性。

一是历史脉络的全景呈现。154处文物点如同一部立体化的“湖北通史”，清晰地勾勒出从远古人类活动、先秦文明、秦汉一统、唐宋兴盛、明清治理到近现代波澜壮阔革命与发展历程的完整历史链条。例如，旧石器时代的“乌龟包遗址”与20世纪70年代的“大市渡槽”并列于名单中，这种强烈的时空对话，生动展现了湖北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与连绵不绝的生命力。

二是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这批省保高度关注地域特色的载体。荆楚文化核心区的遗址墓葬（如荆州“仙女冢墓群”）、湖北廊桥专项调查成果（如咸宁“北山寺廊桥”、恩施“永顺廊桥”等）、皖南鄂东建筑文化区的祠堂民居（如黄冈、黄石多处清代祠堂）、土家族苗族地区的崖墓、老屋（如恩施州多处清代古建筑和岩居），以及革命文物（如红安的将军故居、湘鄂西的革命旧址等）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布局不仅保护了文物本体，更是对湖北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肯定与展示。

三是类型价值的均衡彰显。名单在类型分布上避免了“重古轻今”“重官轻民”的倾向。古遗址（24处）和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含合并项目共73处）构成了两大主体，反映了湖北在考古和近现代史上的双重优势。同时，古建筑（36处）中大量反映民间智慧与乡土生活的廊桥、宗祠、民居入选，以及“黄菊妈墓”（1971年）等，表明保护的眼光更加向下，更加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创造与精神世界，使文物保护更具人文温度。

第九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优化和完善了湖北省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体系，提升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的保护级别，落实了分级分类保护管理制度，进一步夯实湖北省文物大省的地位，有利于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整体提升支点的文化影响力”战略部署的实际行动，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湖北贡献。

（作者系湖北省文物局局长）

山东省滕州市大韩东周墓出土青铜器的保护修复